

总第001期
2017年2月号

中國文化研究 通讯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主办：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顾问：郭立宏 王亚杰 张云翔
主编：李 浩 执行主编：张海青
责任编辑：陈战峰 胡永杰 任雅芳

本期要目

工作简讯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靖边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靖边历史文化资源勘探暨专题研讨会”

活动综述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责任与使命

中华文明源流内涵视野下的靖边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价值

专家观点

张岂之：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

李浩：大雅：传统文化视域中的高等教育资源

● 工作简讯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



2016 年 7 月 9 日,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举行首届学术论坛。来自北京、陕西等地的 40 余位领导、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界人士到会祝贺,并对中国文化的现状及研究中心的发展进行了研讨。

西北大学自 1902 年创建伊始,即注重中国文化的传承和研究,并形成“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理念。学校群英荟萃,贤才云集,经过百余年的积淀,形成了深厚的人文研究学术传统。目前,西北大学拥有一大批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众多相关研究机构,如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东研究所、西北历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院、关学研究院、玄奘研究院、汉唐文学研究院等人文类研究机构,以及文学院、历史学院、文化遗产学院、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等教学机构,研究实力相当雄厚。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旨在整合协调校内各方面力量,开展多领域多学科广覆盖的综合文化研究。目前,由研究中心牵头组建的陕西省中国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先后与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美术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建立了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关系,将有力地推动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研究中心的职责与宗旨是:充分发挥学校人文社科研究的专业优势,增强创新意识,承担国家有关部门的研究课题,力争产出填补学科空白和具有学术前瞻性的精品力作;结合重大问题研究,为国家和文化战略、文化决策提供具有建设性和影响力的咨询报告;承担企业、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委托的各项科研任务;整合力量、重点突破、指导引领、整体提升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优异的学术支撑。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与靖边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 “靖边历史文化资源勘探暨专题研讨会”



2016年11月4日至6日,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靖边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靖边历史文化资源勘探暨专题研讨会”在靖边县成功举行。来自陕西省内外的30余位考古、文化界专家学者对靖边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勘察和研讨。

靖边县位于今陕西省北部,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临界地。这是一块蕴藏有丰富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富饶之地;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厚重之地。众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这里史前就有大量的人类活动和丰富的人类文明遗迹,先秦直至秦汉唐宋时期以后,这里一直是中国北方的边关要地,隋唐时朔方郡的治所曾设于此,十六国时大夏国的都城统万城位于此,近来在靖边县杨桥畔镇还发现一处级别颇高的古城遗址。这里还是20世纪前叶中国红色革命的重要发生地。作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地,靖边一带的历史文化有着与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既千丝万缕联系,又各具特色的独特风貌。

与会专家学者对靖边的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察,对靖边历史文化的价值及地位进行了研讨阐释,对靖边当代文化开发建设的思路也提出了多方面的中肯建议意见。并特别指出,杨桥畔古城遗址具有很高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价值,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与会专家与靖边各界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成效显著、收获很大的学术研讨,并认为,这次会议只是靖边文化研究、发掘、建设工程的一个新的起点,绝不是终点。

● 活动综述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责任与使命

2016 年 7 月 9 日,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并举行首届学术论坛。来自北京、陕西等地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就中国文化研究及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深刻中肯的观点和建议。

一、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原党委书记、教授)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揭牌,是西北大学的一件要事和大事,同时也是我们学界的一件喜事。我们先贤有感于中国文化因袭过重,过于陈腐,所以进行了两次革命,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这两次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引进德先生、赛先生、马先生(整理者按,马先生即马克思主义,这里是一种诙谐的称呼),打倒我们中国的孔先生、孟先生、庄先生。经过长时间的中国文化发展实践证明,这条路过于偏激,当然也走不通,所以有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实际上就是这场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运动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中国传统文化回归运动,主要目的当然是把我们的孔先生、孟先生、庄先生重新树立起来,让他们重新回到我们文化的当中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驱赶走德先生、赛先生,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淡化马先生在中国的地位。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德先生、赛先生、马先生与和我们孔先生、孟先生、庄先生能够和平之、共处之,能够切磋之,融合之,那么中国文化才能真正地博大精深,才能真正有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力。西北大学处于古都长安,古都长安我们知道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首都。过去我们产生了盛唐文化、盛唐气象,盛唐文化、盛唐气象曾被我们学界的老前辈喻为青春少年。也就是说这种文化带有一种强大的朝气,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西北大学正好处于古长安,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可以说既得其时,又得其所在。从学界的角度,我们也衷心地希望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能够团结西北大学的学者,开展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研究,同时也能够团结我们学界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使研究中心既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学术中心,也成为教育中心和传播中心。我们衷心希望它有更远大的前程,为中国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白阿莹(陕西省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初(2015 年),在陕西视察时,就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思路,今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建党 95 周年讲话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重要观点。习总书记在不同时间多次提出文化自信,可见他有着非常深刻地思考和构想,这是当前中央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此时成立,可以说为促进树立文化自信,研究中华文化文明,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力量,是落实总书记讲话要求,积极响应陕西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是非常有眼光的。

陕西省大量历史文物的发现,说明这里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陕西省有大量而丰富的文化遗

产,有待我们去发掘整理。这里我想讲两个故事。一个是2004年陕西榆林发现了石峁遗址,他被国内外专家称为石破惊天之事。考古学者发现,石峁遗址实际是一座古城。这座古城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有城垛、城门、瓮城、马面等,说明古城的形制四千多年来没有革命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四千多年前古人对于城市的认识和观念已相当成熟。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应该从石峁时期算起。二是在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发现的唐代天坛,它比北京天坛还要高,这可能是中国尚存最完整、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唐代建筑。这个天坛之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唐末至宋初时期,长安人民为保护它,自发在它上面覆盖了一层土。这层土,本身就是文物,证明了长安人,陕西人对文物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敬重。

我讲这两个故事意在说明,陕西历史文化需要我们研究、分析、认识的内容很多,带给人们的回味无穷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正好契合了陕西省、西安市的历史文化地位,希望它在学术和文化上,能够做出新的、重要的发现和建设。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正当其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思想文化建设上出现了新的态势,可以说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这一新态势的重要特征之一就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上,这是中央作为一个时代文化的主题提出来的。习近平主席在文化方面有过一系列的表述,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创新问题的系统。这个系统大致来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为统领,中国文化为体,西方文化为用。

所以我说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正当其时。也正是由于此,研究中心应当要清晰地认识到这样的时代态势,要有回应、回答国家在治国理政中产生的、面对的各种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意识。我相信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将会在国家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中,在中国文化的传播推广中做得风生水起,硕果累累,做出重大的成就和贡献。

二、中国文化研究的重点、难点

方光华(西安市副市长)

首先对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我主要想讲这么几个层意思。

第一,研究中心要有一个好的战略定位。这方面,首先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和陕西省委娄勤俭书记高度重视、支持我省文化发展建设的坚定决心及部署。同时也要充分认识世界全球化的大趋势,从这个背景下去思考、确定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定位。

第二,要有一个既具稳定性又有开放性和灵活性的机制。研究中心必须是一个实体机构,这样才能开展好开展工作,我最担心它是一个虚的机构。同时,在人员编制上也要有灵活性和开放新,不能过于固化,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才能更为充分地吸收人才和壮大力量。

第三,要有自己的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比如目前在北京进行的亚洲文明对话,类似这样的内容和形式,我们西安和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完全可以多进行一些。因为历史上中国和亚洲文明的对话交流,主要是在唐代、在长安发生。这方面我们是有显著优势的。

肖云儒(原陕西省文联副主席、文化学者)

西北大学作为中国重要的高校,当然要从中看,从中国看,在文化方面要做高端的研究。但是它既然冠以“西”和“北”两个字,西北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更要朝西看,朝北看,也就是说要做自己的特色研究。

我这里介绍两本书。一本是《另一半中国史》，它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另一半。中国王朝主要是汉民族，或者被汉民族同化的少数民族构成，它的主要舞台在中原，所以中国历史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王朝发展史，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中国历史不仅仅是中原史、汉族史，它是中原和西部的互动史。中原给西部和北部的民族输入比较先进的中原文化，但是西部和北部的各民族又给中原文化输钙，中国文化历史其实是这样一个互动交流史。所以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应该把眼光适当的朝西、朝北移。即以另一种眼光，看另一部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从而开辟新的空间，凸显西北大学研究的特色。

另一本书是叶舒宪的《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这本书启发我们的是，在时间上，我们应该从 4000 年延伸到 8000 年去看中国历史文化，去发现、研究文献记载以前的另一段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如叶舒宪书中所指出，如果说后 4000 年中的秦朝“以书同文”“车同轨”即以文字和政权统一了中国，那么前 4000 年，我们的祖先以“玉”统一了中国，即确立了以玉为象征的价值坐标，以“珠圆玉润”“化干戈为玉帛”的和谐精神统一了我们这个民族。

所以，我认为，如果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能够关注重视“另一半”和“另一段”中国历史和文化，那么侯外庐、张岂之等先生所开创的历史文化研究学派的流脉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廖可斌(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我就几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是定位的问题。中心不能空，不能虚。如果它只是一个虚的机构，那就意义不大，你的设想和计划就会是空谈，难以做出实际的事情。同时也不能小，不能低。全国高校类似的机构已有很多，如果这个机构规模太小，理想太小，层次太低，它的成立可能也意义不大。

第二是思路的问题。中心不叫“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而叫“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个思路很好。前些年社会上特别讲西方文化的时候，我曾参与呼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现在都在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我倒是觉得要注意不要由自信走上自满、自足，不要走向封闭。中国文化复兴，绝不是复辟、复古。中国文化复兴是要走上再一次的兴盛，这当然需要继承传统，但其目的是和新的文化怎么交融，怎么创新。所以我认为，名为“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个思路是有很大气魄的。具体思路，中心要注重立足陕西省自身的历史文化基础，也要关注中国问题，还应有当代意识和世界视野。这方面我觉得可以把中西文化交流作为研究中心工作的一个重点。因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像佛教传入中土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西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都和陕西、西安息息相关。这方面应当注重和加强。

第三，在举措上，也应注意几点。如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西北大学的其他文化研究机构之间关系如何捋顺，将来经费来源问题，工作的具体开展形式问题等。

常绍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

我重点要讲的是，文化研究中心在注重地域性的同时也应具有国际性或者说全球性视野。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吸收世界多种文化融合而成的，具有包容性的特点。西安在古代正是中国文化吸收融合外来文化文明的重要基地。所以中心在研究传统文化和构建当代文化时，都应保有一种国际性的视野。

赵世超(陕西省社科联主席)

我想谈谈研究态度问题。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研究文化、研究学术,最后就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研究学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比较欣赏康德所主张的理性的态度。什么是理性态度?我觉得用陈乐民在《欧洲文明十五讲》里所提出的“顺乎常理,合乎常情”解释比较合适。具有理性的态度才能产生理性的成果,最后才能形成我们西北地区比较朴实,比较理性,不跟风,不凑热闹的学术风尚。带着这种学术风尚,我们才可能走出关中,走向全国,才能使我们的研究产生好的影响力。我们陕西省社科联曾经评出14位陕西社科名家,这些名家有相当一些因为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合乎常理、顺乎常情的态度和立场,以前曾经受到过批判,现在却被选为社科名家。这其中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反思和思考的东西?

董小龙(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副书记)

我就文化中心的发展和工作的看法,谈以下几点个人的看法。

首先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中心的研究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则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阐发。从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动中国文化研究理论创新、知识创新、方法创新,最终使我们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能够相适应,与现代社会发展能够相结合。

第二要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以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本源为我们研究一个逻辑起点,应该提出原创性、规律性的观点,创建出具有我们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

第三,要有系统性和专业性。即突出西北大学学科体系的优势,拓展在文化研究方面的领域,进一步完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使学术研究和现实应用能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文化这个概念范围很大,内容极为丰富。简单说就可分古今文化、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汉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同时谈中国文化,不可避免还要对应外国文化或世界文化。面对这样一个大的对象,大的题目,要想做好,做出成绩,做出特色,首先得要找准自己的立足点。是立足于陕西地方,立足于西部,还是其他?其次还要找好切入点。这么大的概念,你不可能面面俱到,把文化的所有问题都解决,只能发挥优势,从某几个方面切入。最后还要考虑归结点,即你研究的目的是么,归宿是什么。

所以说,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是很必要的,但是首先得把上述这些思路先理清楚,才可能顺利的发展。

刘学智(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任务,我认为重点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它的未来命运(即到哪里去)等问题。西安地区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思想和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很辉煌的历史。就思想领域而言,儒释道诸方面比较,我觉得还是应以儒学为重点。因为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对于儒学的产生发展,是具有发源地的意义和地位的。虽然春秋战国时期,今山东省所在的齐鲁地区儒学非常兴盛,但是其渊源是产生于镐京的西周礼乐文化。而且后来西汉经学、唐代儒学,最发达的地区都是长安。北宋以后西安的文化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一直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所以,我认为西北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儒学应该成为一个重点关注的

领域。西安具有儒学的深厚底蕴,而且儒学也是具有较强实践性,更容易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产生影响的一个领域。

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著名作家)

我受《美文》杂志贾平凹主编和《汉风》(孔子学院散文专刊)主编张华教授的委托,把《美文》杂志、首都文化研究基地孔子学院事业部和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三方战略合作的缘由和想法向大家做一介绍。

去年由《美文》杂志和孔子学院总部合作,创办了一个专刊《汉风》(孔子学院散文专刊),专门刊发孔子学院总部在国外设立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外籍教师及学员的散文作品。创办半年多来,效果非常好,已经走进海外 1100 所大学。为了把这样一个文化推广发展的路子做得更好更强,在西安市方光华副市长的推动下,我们今天又与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至于具体的合作方式和内容,我们还要边进行边摸索,这里暂不多谈。

本来平凹主编和张华教授都是要来参加这次仪式和会议的,由于临时的一些原因,不能到场,我代表他们向大家作以上说明。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

首先,我觉得“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个名字很好。因为这些年我们被那些各种各样的“国学”班搞得很厌烦,很多所谓的“国学”已经背离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对传统文化的严重误解曲解。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它的价值观,其它都是表象,同样,中国传统文化背后支撑它的是其价值观,传承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研究、传承传统文化,首先要确立它的价值观。西北大学把这个机构命名为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而不是国学研究中心,这说明他们在自身定位方面是有纯粹性和远大抱负的。

我近来读吴宓日记很有感触。吴宓有两个时期在拼命地读顾炎武。一个是七七事变时,当时他曾和汤用彤先生有一次对话。吴宓问,万一日本人来了怎么办?汤用彤说,我们守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吴宓为什么要读顾炎武?顾炎武在入清后给他的学生写信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华夏民族道统灭绝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带头守住我们的文化,有朝一日华夏衣冠要恢复,就要靠我们这些人来传承。吴宓在文革期间最艰难的时候给他的同乡李赋宁也说过类似的话,有同样的看法。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核心所在。所以说,现在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它的核心,我们一定要首先确立它核心的东西。

傅光(著名文化学者)

现在大家都在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我打个比喻,中国文化研究好比是一个餐厅的厨房,它做出的食品是要给大众吃,大众的身体不健康,就看他的食品如何。这是厨房的出口。它还有一个进口,这个进口是指它采购的食材是不是精细。什么叫精细呐,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在微观状态是不是精细。出来的成品是宏观研究,这个宏观研究的好坏要看它是不是适合大众的口味,是不是能给大众提供全面的营养。所以说,我们讲文化研究和文化服务现实,也就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关系,两者不是割裂对立的,是二而为一的。现在呼吁回归传统文化,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做得不好,也就是说在微观状态,在厨房的进口做得不好。

大家讲文化研究应接地气,这并不是说自己要变得俗不可耐,而是去提高民众。个人的研究对社

会是否有贡献,按照儒家的要求,可以从四个提高来看:一是俗到雅的提高;二是贱到贵的提高;三是恶到善的提高;四是私向公的提高。文化研究的价值在于引导民众向上,而不是向下牵就,是促进社会从上述四个方面前进。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我在这里想提出新国学与中国文化概念关联性的问题。新国学是王富仁先生这些年来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意在把专指古代的传统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两个传统贯通起来,避免古今对立,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二元对立的思维,从而达到整合弘扬我们所有的文化传统的目的。我们在学科、学术文化发展、建设、创新方面要用加法、乘法的思维,不要用减、除法的,或者说对立消极的思维。这样的话大家进行文化研究的积极性就会得到调动,学科之间互补性等优势会得到彰显。我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也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在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和开展学术研讨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观点和思路,请大家思考。

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特聘教授)

我要谈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文化不仅有大传统,而还有小传统。小传统就是指像中医、武术、气功、太极,禅宗等等(可统称为“功夫”)。所以中国文化研究不仅要研究所谓的大传统,也应该研究小传统。小传统是在今天依然活着的传统,而且是今天老百姓喜闻乐见,亲自践履的传统。它和今天人们的生命、生活息息相关。

中国文化与其说是一种重视理论的文化,不如说它更加重视实践。所以中国文化的精髓往往不是通过理论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它的实践、功夫体现出来。这就导致了中国哲学没有它的独特认识论的传统,因为它始终是强调知行合一的。因而,在谈弘扬中国文化时,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是不是也应重视小传统的研究,考虑和诸如体育学院、中医学院等进行合作。

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我要谈的主要有两点。第一,要按照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看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而且它是一个很典型的跨学科领域,其研究对象是超出西方的。但是它的话语体系是西方的,而且中国的整个学术话语体系都是西方的。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不仅仅属于某个学科,而是属于整个西方社会体系,东方的文化很难进入这个体系。这是我们进行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用中国的话语体系研究中国文化,这也是当前中国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二,要认识到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性的文化。这次论坛很多学者都谈到,中国文化不仅仅是汉民族的文化,而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元性文化。而且汉民族文化自身也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如古代我们吸收了佛教文化,近代以来我们吸收了基督教文化。所以,既然叫中国文化研究,必须认识到它的对象不仅仅是汉民族文化,它的范围要广得多。

四、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责任与使命

郭立宏(西北大学校长,教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类的精神的家园。习近平总书记近来在一系列讲话中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和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去年(2015)九月时任陕西省省长的娄勤俭同志在京内外媒体见面会上也提出:“争取国家在陕建立中国文化中心。”西北大学积极响应,随即

着手相关论证和筹建工作,成立了无行政级别的实体机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今天举行揭牌仪式和学术论坛,正式开启了陕西省高校系统性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播的新征程。

作为具有 114 年文化积淀的综合性大学,西北大学自创建之日起,就扎根三秦大地,始终与陕西和西部地区共命运,同呼吸,致力于传承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融会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谱写出了一篇篇以学报国,兴学求强的壮丽诗篇。西北大学对陕西深厚的文化有更加深切的体会,更加深入的研究实践,孕育了许多中华文化研究领域的杰出成果,在中国思想文化、中东与世界史、周秦汉唐历史和文学、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开拓了具有陕西气派、西大特色的中国文化研究新境界。

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前夕,在乌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通道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习主席在访问期间还专门接见了西北大学在乌考古队的全体成员。这不仅是对西北大学学人的肯定,也是对致力于搭建中华文化交流传播桥梁的所有文化使者的莫大鼓舞。

在今后的工作中,西北大学将充分发挥综合学科和文化优势,邀请一批文化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站在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这一宽广的视角,关注中国优秀文化,搭建好平台,捕捉好资源,与兄弟高校和相关机构一道,汇集中华文化资源,传播中华文化价值,为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陕西高校应有的贡献。

高岭(西北大学副校长、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今年五月十七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的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光、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陕西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传统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2015 年 9 月陕西省委娄勤俭书记又提出了争取把陕西建设成为国家文化中心的倡议,今年 7 月 5 日胡和平省长在外交部陕西全球推介会上发言,也将历史文化作为代表陕西省的一个关键词。

今天我们组建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并在此隆重举行揭牌仪式暨首届学术论坛,就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文化研究、传承、弘扬重任的主动承担和开拓创新。相信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必将对国家文化建设和陕西地方社会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李浩(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感谢各位资深的专家、学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未来的发展、建设献计献策,提出宝贵的建议,也就各自的专业领域、研究兴趣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解提出看法、主张,讨论非常深入。虽然本次论坛没有设立具体议题,但大家都是在中国文化研究大的范围、视域中进行讨论、阐述,令我受益良多。中心将来的工作和思路,我们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开门开放地办中心。中心主要不是靠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来研究,而是重在发挥平台作用,为学科之间的协同、校际的协同等创造条件,推动文化研究。其二、兼容并包、多元对话。中心涵盖多

个专业领域,专业不同,但都是在中国文化研究之中。包容性和多元性,将是中心的重要特征。其三、注重特色。宁求少而精,不求泛而浅,做一点就要做好。其四、中心是平台,不持立场。通过平台吸纳各方专家,服务大家把中国文化研究的戏唱好。其五、追求卓越品质。不管做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追求卓越,以西北大学的高校特点来做好研究,守住本位。其六、注重文化影响。通过一流的研究成果、一流的学术、一流学者来影响社会,也为西北大学双一流建设添砖加瓦。其七、中心的活动。将会开展系列活动,形式将会多样化,如专题研讨、小型论坛、笔谈等。

现在中心才刚刚成立,还要不断成长,希望各位专家、各界朋友多多支持和批评,希望研究中心借着大好的时代形势,不断成长。

(本文系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首届高层学术论坛上部分专家观点的整理稿,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21日,由胡永杰整理,此次收录略有修改补充。)

中华文明源流内涵视野下的靖边 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价值

靖边县,位于今陕西省北部,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临界地。这是一块富饶之地,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厚重之地,这里还是20世纪前叶中国红色革命的重要发生地。作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地,靖边一带的历史文化有着与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既千丝万缕相连,又自具特色的独特风貌。近来在靖边县杨桥畔镇发现一处古城遗址,有可能就是古代的阳周古城。2016年11月,来自北京等地及陕西省内的考古、文化界专家学者对靖边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对靖边历史文化的源流、地位进行了梳理研讨,对当代靖边文化事业的建设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一、靖边的历史文化及资源遗存

李浩(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靖边地处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的交接带,历史上也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过渡带。按照国际知名学者张广达先生的解释,长城的蜿蜒曲折,与这两种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密切相关。靖边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这包括青阳岔、天赐湾、小河等红色革命遗址,也包括龙洲丹霞地貌等自然景观,还包括杨桥畔汉代遗址、统万城大夏国遗址、明代长城遗址等,都弥足珍贵,需要保护、研究和科学开发。根据著名隋唐史专家荣新江、历史地理学家侯甬坚等的研究,中古时期的统万城一带,活跃着匈奴、鲜卑、稽胡、党项、汉人等,这里也曾是丝绸之路的干道所经之地,因此也经常往来有西亚、中亚的人群,特别是昭武九姓诸国人,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总书记讲这话的背景是国际文化交流,但这一理论对于历史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对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文化双向馈赠”可

以说很大程度上也是适用的。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靖边的历史文化发展充分映证了文明交流互鉴理论。

薛保勤(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原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中国历来有重视朝廷文化,忽视边关文化,重朝廷而轻民间的一种倾向。对于靖边这样一个边关小城,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我们以前常常是不以为然的。但是,试遐想,如果没有边关,何来朝廷,没有边城,何来都城?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正是书写中国民族融合史,中国北方边关史的最好的研究对象之一。

吴克敬(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文明除农耕文明、草原文明之外还有没有第三种文明?我几年前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今天到靖边考察,听到这里“胡搅汉,汉搅胡”的说法,其实就说明中国以长城为线,以陕北为界,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第三种文明,这种文明可以叫作杂交文明。这是非常具有优势的一种文明,是值得我们考古学者、文化学者研究的一个现象。

马明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史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我于 2004 年开始参加国家文物局课题《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生业与环境》的调查研究工作,从我们的调查结果发现,靖边在古代具有明显地理优势。一方面是交通优势。靖边南部的白于山区,是这里的制高点,古秦道由南向北,长城则基本呈由东北向西南走向,都经过白于山区。所以这里在交通上是北方的大十字路口,位置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是水系河流优势。北方的几条大河像泾河、北洛河、延河、无定河等,都是环绕白于山区域,向四周发散,流向黄河,从这个地区水系的发达程度、水系各层级支流的密集度看,这里是有利于古人类生存、古遗址分布的。经过调查,沿白于山周边发现了大量史前时期的历史遗存。特别要强调的是,早期,即仰韶文化早期到中期的时候,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遗迹大量分布在白于山区河流的上游,而河流的下游仰韶文化早期的遗迹则比较少。这说明仰韶文化由北向南迁移的过程中,白于山区河流的上游,恰恰是早期人类北上过程中的一个聚集地。到了仰韶晚期及龙山时期才逐步向下游扩散。

经过这几年对大理河流域及靖边其他地区的考古调查,发现史前到先秦两汉时期,这个区域的文化列是完整的。需强调的是,到了龙山时期,这个地区的遗存密度突然增大了,整个陕北地区都呈现这样一个大的趋势。这一现象可以支撑石峁(即位于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古城遗址,属龙山时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这样一个背景说明,当时这个区域文化非常繁荣。而且,这里和西边的西夏文化联系也很紧密。西夏文化在泾河流域发现有大量遗存,像龙山时的瓦等高等级的文化迹象也曾出现。白于山区介于西夏和石峁之间,是它的接触地带,位置非常重要。到了战国秦汉时期,这里有长城、大型城址、大型墓地等遗存,规格都比较高,特别是杨桥畔,我们先后发掘四次地方墓,一处城址对应至少三处墓地,这在其他县是很少见的。这些也都说明,靖边地区在整个史前到秦汉时期,文化的发达是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地位相当重要。

齐志(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收藏家)

我是靖边人,多年来一直关注靖边一带的文物,所以我想就自己了解掌握的情况做一些介绍。靖边石器时代的遗址及物品,在高家沟、杨桥畔一带就有多处。杨桥畔镇一带在汉代就已经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城池,这里发现过不少汉代的钱币、印章、箭镞等,还出土过没有使用过的整坑的钱币以及不少钱范(铸币模具),那里还有汉代大型的瓦窑遗址。瓦当一般出现在杨桥畔的瓦渣梁一带,它的风

格和西安不同。杨桥畔的古墓遍布方圆几公里,除了瓦渣梁、西沙古墓群外,原乡政府后边的居民区,盖房打墙的时候也经常挖出汉代的墓葬,有些墓里还有非常精美的壁画。瓦渣梁的古墓,有时候是重叠起来的,过去修公路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说明几个朝代的人埋在了相同的地方。杨桥畔的汉代古城还出土过一件体积硕大的青铜器“上林铜钟”,上林铜钟上有明确的系年为汉永始三年(前14)。上林就是上林苑,是汉代长安的皇家宫苑,上林铜钟在杨桥畔现身,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和这个边塞之地非同寻常的关系。在统万城周边还发现过古罗马时期的金币,表明匈奴通过西域跟罗马之间也发生过贸易关系,在大夏国之后这种融合与交流一直都在进行,我们发现的文物里有西夏国的物品,我今天带了个陶罐,明显不是汉文化的东西,上面有几个字,不是汉字。在统万城周边发现的古墓,西魏、北周的有,隋唐五代的比较多,少有北宋以后的文物,这跟史料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乔建军(陕西省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

2011年第三次国家文物普查,公布的榆林市文物有13883处,其中靖边县是973处。靖边又以古遗址最多,达780处,古墓葬172处。古遗址中分量最重的属秦汉时期,占80%,史前遗址目前掌握的数量是220处。需说明的是,榆林市文物数量占到陕西省的28.3%,占到全国的1.8%,这个比重很高,可以说明陕北地区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重要性。

二、杨桥畔古城遗址与古代阳周城

焦南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前院长、研究员)

这次我们考察了靖边县杨桥畔镇瓦渣梁村古城遗址,从目前出土的东西来看,可以大致确认为是西汉到王莽时期的一个大型遗址,至于能不能早到战国、秦,目前还缺乏实物证据。现场我们看到一些内附麻点纹的筒瓦、板瓦片,这种瓦的使用时代,上限是战国,下限是西汉早期,文景之前。所以这些瓦,其时代定早一些,可以在战国,晚一些更保险一些,定为汉初比较合适。目前从其它出土文物的情况看,还缺乏可以早到战国时期的依据。可以说,这是西汉时期一个大的聚落遗址,这个遗址的性质,从现在看到的证据,比如大面积的砖铺地面,规整的排水道,都说明这个遗址的级别是很高的,当时只有宫殿、官署才能用这样的建筑材料。再加上据考古队介绍的勘探结果,这个城周长有一千多米,这样的规模,依据在北方地区的考古经验,作为一个县城也还是可以的,南方的话县城的边长会更小一些。所以,从它的已有材料和规模来看,应该说是一个西汉到王莽或再晚一些时期的一个县级城址,目前做这样的判断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我看到了采集的“阳周侯”“奢延左尉”印章的照片,看起来不像是假的,还有一个有“阳周塞司马”的陶罐,它们给这座城的定名、定性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是我无法确定它们的出土地点,做为依据的话还需要慎重。

今天有九位考古界学者作了发言,结合大家的意见,我认为靖边杨桥畔镇瓦渣梁村古城遗址,从各个方面资料的分析来看,它与文献中有关阳周古城的相关记载基本吻合。

段清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考古学系教授)

陕北地区的历史考古,最复杂的是阳周城所在地,这个问题弄清楚了,陕北所有的与阳周城相关的坐标点几乎都可以理清了。从文献记载来看,对于历代朝廷而言,阳周城以西,白于山以北一直都是陕北的战略重地,在交通、自然环境、军事防御上都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在这个区域里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城池,是合乎情理的。

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整个陕西榆林地区的秦汉城池情况来看,阳周城所在地可能非靖边县杨桥

畔瓦渣梁的这个古城遗址莫属。其他都和这个城池无法相比。目前杨桥畔这个城池遗址,有两点可以判断它的重要性。

一是战略位置上。战国秦长城、明长城都是从它的西北经过,再往西北,就是毛乌素沙漠。这里就是白于山的高地,不同时代的人都选择在这里建长城,一定有他们的需求,比如这里的用水等,这是最要的一点。而且,战国、隋、明长城都是从榆林而来,在这里有一个拐点,专门拐到这里,应该说是有其战略位置方面的原因的。这两点我在调查其他秦汉长城遗址中是没有发现的。

二是就发现的实物上看,确实可以说它是所有发现的秦汉城池中最重要的。如“阳周塞司马”陶罐、阳周侯印、奢延左尉(后两个虽然没看到,尚不能说真假),可以作为证据,还有城里所出现大型的板瓦、瓦当,这些不是一般的县城能有的,必须是高等级的、或和皇室有关系的建筑才能使用这些瓦当等。据说还出土有带有“阳周宫”字样的物品,我没有见过,如果是真的,则说明这里有可能就是历史上某一时期的行宫。还有出土的半两钱、五铢钱、不同时代的铜铍,以及更晚王莽时期的大量货币等物。秦、西汉时期,长安复兴之前,宫殿铺砖的现象几乎没有,都是三合土铺地,今天看到的杨桥畔这个城池遗址有砖铺地面,这个砖可能比较晚。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这个城可能是古代陕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它的历史可能非常悠久。虽然没有看到实物,但是根据我调查秦长城的经验判断,这里可能是战国时就开始设的一个据点,而且从战国的一直到王莽、东汉、甚至更晚时期,这里应该都是一个重要的据点。从这些考古的证据上看,目前这里大致指向阳周城,是问题不大的。当然这是从目前的证据中感觉可能如此,要最终证实,还需要进一步统筹的规划、发掘,拿出更硬实的证据。

戴应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阳周塞司马”陶罐、“阳周宫”瓦当的出土,基本可以确定阳周城在靖边一带,我再补充一点,这里还出土了“阳周侯”印,罗福颐先生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徵存》里边没有收录,这个印也很有价值的。所以靖边杨桥畔这个古城遗址很值得重视,应尽快展开进一步的保护、挖掘、研究工作。

钱耀鹏(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教授)

阳周古城,刚才几位专家说得很好,我补充一点。秦汉考古,都城、陵墓发掘了不少,但是县城遗址几乎还未见有完整的发现。所以杨桥畔这个古城遗址,无论是不是阳周城,挖掘出来都是有意义的。它至少是一个汉代的县城,这样的遗址全国还没有几个,只要做出来都是标志性的,将给汉代城市的研究提供非常好的、标志性的资料。这个应该进行好好的规划,尽快展开发掘研究工作。

吕卓民(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教授)

靖边的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展开杨桥畔古城遗址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关于古阳周城的位置,目前还没有可以作为铁证的资料证明就在靖边,就是杨桥畔古城,目前的观点看法都是推测性的,所以进行再探索和论证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杨桥畔的古城遗址,我希望有关方面多做工作,尽快把这个古城的性质搞清楚,盼望能在那里找出铁证来。

三、靖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路及态度

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评论家协会主席)

这次在靖边考察,我初步了解到这里的历史及文化遗迹,可以说是大吃一惊。我对靖边的历史文化的发掘也抱有很大的期望,同时我也期望,我们不要急于先做结论,而是把问题推到全国性的学术平台、全国性的媒体面前,让大家开始争论。争论的过程是一个向真理推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让

大家获得认知的过程,在真相还不清楚之前不必急于做出结论。这次会议应是一个起点,是让全国学术界开始关注、认识、思考、研究、争论靖边的历史文化问题的起点。

段建军(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靖边的历史文化,有些属于传说,目前尚无法考证,我们不要非要坐实它不可。其实有时候想象、传说这种对历史文化诗意的表达也非常美好,也很激励人,能教育后人。所以我们要把虚实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是考古,一方面是文学创造,不能仅仅强调实地考察,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这里的人们,包括整个中国的人们能够诗意的生存,实证考据不是最终的目的。

穆涛(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美文》杂志执行主编)

靖边历史文化的开发建设,除了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之外,还要进行文献史料方面的整理,这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这里曾经是朔方郡等重要行政机构的治所所在地,那么把每个时代这里的行政归属、管辖情况搞清楚,把当时的河流山川梳理清楚,把历史上这里的国计民生的东西,老百姓过日子的东西,做出一些扎实可靠的资料出来。这样就能把靖边在中华文明历史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呈现出来,这个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刘伟评(《西北大学学报》主编、文学院教授)

希望靖边当地在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保护、利用方面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并重。一是硬历史文化资源和软历史文化资源并重。即物质遗存、名胜古迹、乡土文物等物质性资源与本地历史人物、生产技能、风土民情、口头文艺等精神性的资源并重。二是古代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当代历史文化资源并重。即像统万城之类的古代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的红色历史遗址、劳动人民创造的新历史文化景观(如三边文化等)并重。三是还要注意当下开发利用和长远开发利用并重。

杨乐生(西北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

对于靖边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开发,我建议要有一个客观理性的心态和姿态。也就是说论证靖边的文化,要讲证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要盲目扩大自己的文化资源。对于其他地域的相关文化资源,要给予尊重,要有共赢的心态,不必去争地盘。同时我也建议,对于文化资源的保护要从现在开始,能够申请到国家的资助当然更好,也很必要,但不要等到立了项再去保护,国家不立项,当地相关部门也要着手进行保护。另外也建议,谈历史文化时,也要关心当代文化建设,要让历史文化为当代文化服务。

周燕芬(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靖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打开视野,要学习国内外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些好的做法,借鉴他们在保护开发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尽可能避免短期的一种利害心态。在进行靖边文化个性化发展时,要先考虑我们以什么来取胜?怎么去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

刘东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靖边的文化资源开发建设,一是要有高位的布局和整体的研究开发规划,并分步去实施推进,特别是要注意定位突破和典型性。二是注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结合,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传统的文化是静态的,但它必定是面对现代人并对未来人们负责,所以要想办让它动态化,让它成为让人能活生生的感受到的资源。

卢燕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靖边的历史文化资源很丰富,也可以说很有优势。对于可能为阳周城的杨桥畔的古城遗址,到底

是个什么情况,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继续研究,但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看到的眼前的东西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么这个真实存在自身就为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创作留下了很广阔的空间。

刘丰(西北大学社科处处长)

靖边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中华文明不仅是周秦汉唐的中原文化,还包括一些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互相交融交通而产生的文化和文明,它们更多发生在包括靖边在内的这片有特殊意义的土地上。今天我在这里又看到一些新的遗址,再一次印证了上述论断。所以,我们应该以更加广阔的视野、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资源,不要急于去开发,应慢慢去发掘它、论证它,更要好好地保护它

姬乃军(延安市文管办主任)

靖边在大力关注历史文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里的现代文化。我举一个例子,红色革命时期,吴起镇其实属于陕甘宁边区西靖边县,也是靖边的文化资源,大家以前没有注意。我想提醒,也要进一步重视靖边红色文化、当代文化等资源的研究发掘。

张国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由于天气方面的原因,虽然未能到会,但我对靖边的历史文化资料做了仔细的研读和思考。我希望靖边的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要汲取历史教训,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黄帝葬地来说,如果相关几地共同申报,共同建设,可能会实现共赢。

(本文系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靖边县政府联合举办的“靖边历史文化资源勘探暨专题研讨会”上部分专家观点的整理稿,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11 月 28 日,由胡永杰整理,此次收录略有修改。)

● 专家观点

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

张岂之

中华文明是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 5000 多年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和魂。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这表明，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信，应走入历史纵深，深入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土壤。

“百家争鸣”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

习近平同志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中法两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术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重要论断，立足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准确概括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及其时代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上产生了诸子百家，据汉代司马谈的看法，其中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共六家。诸子百家的“家”，就是指形成了学派，有理论、宗旨和传承。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号称“百家”。“百家争鸣”的出现，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迸发出耀眼光芒。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士”这个阶层特别活跃，他们大多积极参与和影响政治，也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士”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使“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解生民于倒悬，重建社会秩序。“士”的政治地位非常高，因为当时各方诸侯都在互相比拼，需要内政外交各方面懂行的人来辅助，而士人正是这些方面的行家里手。作为士人代表的诸子百家，于是竞相登场，各展所长。

就哲学思想而言，儒道两家各有侧重。孔子重视“仁”的思想，“仁”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君子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君子的人生价值正在此。老子哲学则不然，“天道”受赞扬，“人道”遭贬损。在他看来，“道”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人道”当效法“天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重“人道”，道家重“天道”，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就政治主张而言，儒墨两家都倡导贤人政治。在贤人的来源方面，墨子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认为选拔官员要以德能为标准，哪怕地位低微，只要有德有能，就应选拔上来，委以官职，这样才能做到公道正派。在贤人的待遇方面，墨子主张“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也就是给贤良之士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信任、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营造鼓励贤良之士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样贤人就会越来越多，用他们去治国就会显出成效来。这些选人用人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就自然科学而言，先秦诸子中研究最广泛、最深入的是墨家。墨子及其后学的文化贡献，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做了奠基工作。墨家建立了严谨的逻辑体系，并将其应用于自然科学，

对时空、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用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概括,体现了科学家和能工巧匠的创新思路,是诸子百家中大放异彩的一朵奇葩。

正如庄子所说,诸子百家的观点都体现了“道术”即宇宙真理的某一方面。虽然各家各派立论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对世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以诸子百家为重要代表的中华文化显示出强劲生命力,始终以开放姿态吸取各种养分,在会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各家理论,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

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营造了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

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过战乱和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关于这一点,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 21 世纪》中有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正是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扬光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别是在近代,中华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共同的政治信念,极大地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族能够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不仅是因为它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历史上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的时期,比如鲜卑(北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清)。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都处于比中原汉族低的发展阶段,因此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改变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战国时代,我国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汉并天下以后,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被肃清,地域文化也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与这个总的形势相适应,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才真正形成。这个文化共同体虽然以儒学为主导,但并没有阻碍其他学派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于是提出了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问题。在唐、宋时期,儒、道、释的融合会通,将中华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中华文化的形成、传播、发展与汉字息息相关。汉字源远流长,起源于模仿自然、图画纪事、表情达意的需要,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符号系统。经过长期的演变与实践,逐渐形成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与假借六种造字法与用字法,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的人文情怀。汉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等多种形式。秦始皇一统中国后,为统一汉字书写,采用小篆。我国各地乡音不同,但书面语言相同,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坚实载体和重要保证。文字的统一,有效促进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国家政令畅通,对实现国家统一和多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字的统一与各地方言乡音并存,在相同中保留特色,体现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

汉字的相对稳定,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作出了独特贡献。汉字具有象形与表意的特点,在表达人文精神以及人与万物关系方面简明扼要、形象生动。即使时过境迁,后来者在阅读古籍时同样可

以由文辞而把握其道理与智慧,将世代积累的优秀文明成果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孔子对文字很重视,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思想要传播久远,需要有文采的语言文字记载。古人所强调的“三不朽”,其中之一就是“立言”,足见文字在文明传承中的重要意义。我国古代有“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传统,显示了文化典籍和语言文字在传承思想、培育人才与改善社会风气中的积极作用。

丰富的语言文字,需要相关的工具书帮助人们掌握。东汉许慎撰写的字书《说文解字》,通过剖析文字构件(文)来解说字义,对规范字形、字音与字义作出了贡献。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甚至成为显学,代表性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词书《尔雅》,保留了大量多学科(特别是博物学)知识,为丰富汉语词汇的语言形式、融会沟通词语的意义打下了基础,经过魏晋学者的努力,成为阅读《五经》的重要准备,后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中。

独特的语言文字、风格多样的书写形式,形成了符合人们审美需要和表达人们审美感受的书法艺术。书法以艺术形式表达人们的思想、修养、爱好与情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毫端”。因此,不同时期的书法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观、历史观与人生观,它们既受到历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又间接地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丰富内涵,如易学的阴阳相推思想、儒家的中庸学说、道家的相反相成观念、禅宗的顿悟静修主张等。书画同源,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对独特的中国国画(水墨画)的形成影响很大,它们共同成为中华文化殿堂中的璀璨珍宝。

在某种意义上,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古今传承,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对外域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语言文字的翻译,而且侧重思想内容的介绍与阐释,注意从整体性上加以理解,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是从整体上加以研究的,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公元13世纪初,印度佛教式微以后,其中许多教派和经典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源头。这是中国佛教学者全面整理印度佛教文化的结果,对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博大精深的文献典籍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中华文献作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括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于我们从文献典籍的角度认识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指导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一般说来实行政教分离,没有形成像西欧那样的宗教黑暗时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学,为不平等社会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点。我们可以看到,皇权统治以经学为工具,而民间亦以经学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经学有关。西汉时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成为“九经”;后又加《论语》《孝经》《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十二经”加《孟子》,形成“十三经”。

儒家的经书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是社会演进的需要,目的是使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不致发生冲突。儒家经书既维护我国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又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儒家经典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使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适用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普及本,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其中的价值观进入当时青少年的头脑。应当指出,这些观念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今天不能简单照搬。除去儒家经书,中国还有史书,各个思想文

化学派的代表作,以及个人的文集等。经史子集,汗牛充栋。

对文献的整理,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清代产生了“汉学”,众多学者精心研究整理古代文献,纠正了许多错误。学者们在研究中探索和掌握了一系列严密的搜集、排比、分类以及识别文献资料的方法,为保护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智慧和心血。

(本文原刊于《人民日报》2016 年 9 月 2 日,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著名中国思想史家。)

大雅：传统文化视域中的高等教育资源

李 浩

内容提要:习惯上认为,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主要应该从西方教育文化横向地移植最新的模式,汲取最多的营养。本文在有条件地肯定横向移植的同时,强调纵向继承,认为特别应该在本土文化视野中找寻资源。文章梳理了传统文化中的高等教育理念、教育实践以及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对这些本土学术话语的重新阐释,以俟为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某种借镜和启示。

关键词:传统文化 学术话语 高等教育 资源萃取 借镜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一

一般认为,现代大学教育或高等教育起源于欧洲,最早的大学可以追溯到创建于 1087 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现代学术型的大学起源于德国洪堡大学。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则与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有关。这似乎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常识,笔者无意于挑战高等教育史上的这些基本共识。治教育史而博学者,言必称洪堡者在在不少,更有开谈不说 MIT(麻省理工),读尽诗书也枉然。当下开展的“双一流”建设,更助推了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基准看齐,而一流大学的标准似乎就是对国外大学先进理念与实践的认知。

本文拟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前现代的中国有无自己的高等教育? 如果有,其理念与实践对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双一流”建设有无启示? 若无,那么至少三千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高等级人才培养或精英人才培养,有何经验教训值得反思? 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除了横向移植外,可否也能做一点纵向借鉴的实验与尝试?

一、刻意回避本土资源的 20 世纪高等教育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维新派鼓吹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这确实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剧变”,在当时及后来都引起很大的震动。有学者甚至说,满清帝制的灭亡,不是亡于武昌首义的新军,而是亡于被断绝了仕进通道的士人举子。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此不枝蔓赘述。但是,学者在论述时多将科举作为新式教育的对立面,则是应该商榷的。应该说,一废一兴,两者自然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废科举与兴学堂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对立(对举)关系。循名责实,科举作为旧式的选人用人制度,与它对立的是新式的程序正义、唯才是举的新型人才选拔制度。而新式学堂作为新式的学校制度或人才培养机构,与它对立的是旧式的学校制度或古典的教育制度。因为仇视科举,废止了科举,连类而及,

同时将为科举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也全盘否定了。在倒脏水时,连澡盆中的孩子一起倒掉了,以此表示咸与维新,与旧制度作彻底的决裂。过往的社会变革激进论者最容易患上左派幼稚病,似乎也有一个通则。此后,无论是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初创期的全盘欧美化,还是大陆解放后高等教育再生期的全盘俄苏化,都是将古典教育制度作为批判对象。若同中求异,二十世纪初的破旧立新,仅仅将本土的古典教育作为靶标,而二十世纪中叶的再次除旧布新则将古典(封建主义教育)与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统统视为靶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虽恢复了新一轮向欧美高等教育学习,但迄今仍未敢理直气壮地提出向本土的古典教育学习,所以对于教育界而言,这种恢复与开放仍然是有限度的。

当下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如果仅仅取法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资源,一百多年的河流短暂而清浅;如果还能取资欧洲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古典大学教育史,一千多年的时间之河上水光潋潋,山色空蒙,看起来似乎也不错;但如果溯流而上,沿波讨源,从前现代的本土文化中发现教育资源,我们既能看到下游的茫茫九派,壮阔波澜,又能追溯到上游复杂多样的水文地貌,滥觞处也许不是标准的河流仅仅是一块广袤的湿地,但它涵养着水源,蕴藏着各种濒危的动植物标本,这是本土教育资源的原生态,也是本土文化的基因库。在笔者看来,毫无疑问,前现代的中国有自己的古典型的高等教育或大学教育,他们不光承担了那个时代传承文明、创新知识、培养人才的使命,而且也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理念、方法和实践,可以通过转化性地创造,转换成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可供选择的资源。这对于突破当下高等教育改革的瓶颈,消弭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种种歧见和误解,引领未来中国高等教育走上充满自信的向上一路,将会裨益无穷。

二、传统文化中的高等教育理念

关于大学概念的提出^①,《礼记·明堂位》第十四中说:“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第五:“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邑里)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这几段文献中的个别文字有异辞,学童何时进入大学的时间也有不同说法,大学的“四学”“五学”也有异称,但如我们说,早在殷周时期就有了中国式的贵族学校教育制度(其中包含大学体系),则异议不会太多。殷商出现于公元前17世纪,西周出现于公元前11世纪,距今都超过了三千年,则中国前现代古典型高等教育出现的时间就约略可知了。

近年来,笔者先后撰写过《我之大学教育观》《人文何以化成:新国学教育的三个境界》《传统与开新》等文,相关论述还辑录为学术随笔集《课比天大》^②,曾引起不少关注。坦白地讲,我著述中提及的那些大学理念大多是阅读古代文化典籍时所获一鳞半爪,而且仅仅是初步简单的罗列,甚至可能是生吞活剥,并未能完全消化,如稍微整齐化一下,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

关于教育目的。《礼记·大学》第四十二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① 据文献载,甲骨文中已出现大学之名,因本文不涉及大学名称概念源起的考证,有关论述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王贵民《从殷墟甲骨文论古代学校教育》,《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

^② 《我之大学教育观》见《中国科学报》2013年1月17日,《人文何以化成:新国学教育的三个境界》见《光明日报》2013年4月1日,《传统与开新》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23日,三文皆收入拙著《课比天大》(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又,《礼记·中庸》第三十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无论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学原理类著述,还是目前正在开展的各学校《大学章程》撰写,都不敢理直气壮地将这些论述直接引用,视做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办学宗旨。硬要自己拍脑袋拼凑一些东西,其实在这方面编新不如述旧。有意思的是,如果翻阅教育史料,我们会发现民国时期设立的大学,或海外汉文圈中的一些大学,反倒敢理直气壮地将这些语录引作校训或办学理念。

校训、校歌、校徽、校旗、学校章程往往是一个学校办学宗旨、办学理念的最集中体现。有意思的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期设立的大学虽然学校的体制是新式的现代的,但在校训校歌中却仍直接引用或化用古典教育理念,五十年代至文革十年这种做法被废止。打倒“四人帮”后,有些学校恢复了原来的校训和校歌,也有不少学校是新编新写,以示与时俱进。我们比较熟悉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南开大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厦门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苏州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西北大学的校训“公诚勤朴”,西北工业大学的校训“公诚勇毅”(来源于原国立西北工学院院训),都是继承学校老传统,述旧为新的例子。台湾中兴大学校门口将《论语·述而》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句孔学要旨,邀请书法名家陈其銓、杜忠誥、汪中和王静芝等教授书写刻石,成为“孔学要旨石碑”(见附图一),既是学校理念与宗旨的体现,又俨然成为学校校园的人文景观地标。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讲学与思的辩证关系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礼记·学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其此之谓乎!”这一段侧重说教学。又,《礼记·中庸》第三十一还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几段语录虽侧重说学习的方法,但不是孤立地绝对地讲某某方法重要,而是辩证地从学习的整个过程,从诸种关系中来把握各种方法。二十世纪前半叶设立的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校训直接引用或化用这段话,可见古典的教育理念仍然启迪着现代的智慧之光。

在讨论读书方法时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英国哲学家培根说:“有些书可供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这就是说,有些书只要读读他们的一部分就够了,有些书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还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有些书也可以请代表去读,并且由别人替我做出节要来,但是这种办法只适于次要的议论和次要的书籍,否则录要的书就和蒸馏的水一样,都是无味的东西。”^①与孟子所说可以参照比较,孟子讲得很简要,而培根讲得更详细切实。

关于素质教育。虽然关于素质教育的内涵及名称,一直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对此概念有过多的否定^②。但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此概念视作通识教育、通才教育、博雅教育的替换词使用,不在此作进一步辨析区分。《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三物”应是基础教育

① 《培根论说文集》第五十《论学问》,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

② 见郑也夫著《吾国教育病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的基本内容,所谓“六德”应是六种道德规范,所谓“六行”应是六种合乎道德的行为,而所谓“六艺”则是一个君子应该掌握的六种技能,也是六门技能课程。六德、六行与六艺合起来称为“乡三物”。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从周朝以来,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古典素养教育,其范围不仅大于西方的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也远大于时下方兴未艾的素质教育,倒是有点类似目前哈佛大学等教育机构所推展的“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这是时下倡导素质教育者应注意区别和辨析的。其次,“乡三物”中的许多内容,有的属于基础教育,但又不限于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仍然继续贯穿。比如“六艺”的课程。

与本文题旨密切相关的是,已有学者指出“全人教育”的理念来源于日本教育学家小原国芳的“十二教育信条”,即:(1)全人教育;(2)尊重个性的教育;(3)自学自律(重视学生的自学和自我约束的能力);(4)高效率的教育(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精选教材、改善教学方法和提高学习兴趣);(5)立足于学的教育(改变立足于教的指导思想);(6)尊重自然;(7)师生间的温情(尊师爱生);(8)劳作教育(培养知行合一的坚强意志和实践能力);(9)对立的合一(使两种对立的品质合于一身);(10)尽量满足他人的愿望和作人生开拓者;(11)学塾教育(继承日本古代学塾的传统,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祈祷);(12)国际教育。小原国芳在《全人教育论》中还说:“学问的理想在于真,道德的理想在于善,艺术的理想在于美,宗教的理想在于圣,身体的理想在于健,生活的理想在于富”。“这六方面的文化价值就像秋天庭院里盛开的大波斯菊花一样,希望和谐地生长”。他将学问、道德、艺术、宗教、身体、生活的真、善、美、圣、健、富比作大波斯花的六个花瓣,每个花瓣代表全人的一个方面,六者和谐发展,缺一不可^①。这种认识既受到西方教育文化的影响,又有日本的教育实践,也能看到中国古典教育的影子。他的六瓣说显然与《周礼》中的六德说、六行说、六艺说秘响旁通,可以互相发挥。

关于人才培养。马端临《文献通考》提及夏“以射造士”,商“以乐造士”,周“以礼造士”,说明三代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对人才培养与使用的侧重点也不同。清人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中说:“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喻指教师的牺牲与奉献,对学生健康成长是有意义的。又其二二〇写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虽是一首青词,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当下,诗人呼唤不拘一格育才、不拘一格用才的热诚仍有当下意义。

关于师资队伍。《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以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是由秦汉以来的思想演生而来的。

岳麓书院崇道祠还有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斯文正脉”四个大字。在岳麓书院讲堂的门上,由山长旷敏本撰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下联是:“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古代儒家设置的祭祀牌位为天、地、君、亲、师,构成社会成员最基本的五种关系,迄今在民间仍有很大的影响(见附图二)。钱穆曾说:“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于《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②这就使得教师这一职业与

^① 见《小原国芳选集》第三卷,日本玉川大学出版社,1970年(昭和55年)。潘光旦考察在欧美教育后,也曾将教育的功能归纳为德、智、体、群、美、富等“六育”。参见潘乃谷、潘乃和编《潘光旦教育文存》,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 钱穆《晚学盲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2页。有关“天地君亲师”的观念最早出现于何时、源于何典籍说法较多,最新的研究参见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劳动力市场上的其他出卖体力、出卖智力(知力)者有了本质区别,在现代人看来,学成文武艺,可以货于帝王家,也可以货于资本家。但是在中国古人看来,一旦作了教师,成了受教育者的“教父”(或教傅、保傅),与学生缔结了血统之外的“学统”(道统)关系,那么就不是劳动力市场上买与卖的关系那么简单了。故不能用商家经营理念中的“顾客是上帝”云云,来对接学校中的师生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生被定位为接受教育者,被开蒙者。师生反目、师生决裂,比夫妻关系破裂更为人们关注。师生关系取得了拟血缘的地位,也使得人们对教师的遴选、教师队伍的建设有着几近苛刻的要求。

三、传统文化中的高等教育实践

关于素质教育的实践。《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注：“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①钱穆说：“本章所举四端，孔门教学之条目。惟其次第轻重之间，则犹有说者。……志道、据德、依仁三者，有先后无轻重。而三者之于游艺，则有其轻重无先后，斯为大人之学。”^②李泽厚说：“这大概是孔子教学总纲。‘游’，朱熹注为‘玩物适情之谓’，不够充分。而应是因熟练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有如鱼之在水，十分自由，即通过技艺之熟练掌握，获得自由，从而愉快也。就是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快乐也。”^③

关于精英教育的实践。古代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贵族和皇族中间。接受教育者是有等级身份的限制的。与现代的大众教育、普及教育有本质的区别。但他们对接受教育者的精心、精致和精细，视学生如己出，则是现代教育者应该学习的。孟子讲君子有三乐，其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第三乐。刘源俊认为这句话的九个字应重组，改为“教育而得天下之英才”，这样才能与“有教无类”的意思相通，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莫如教育而得天下之英才。^④即便如此，重点仍是在说教育可以把受教育者变成社会的英才和精英。

关于小班教学的实践。早期的辟雍、太学等，后来的国子监、四门学等招收学生都有限，故有推行小班教学的可能性。包括春秋时期的私学、宋元以后的书院，规模都不很大，也是一种变相的小班制。西方大学中的“班”是指同一专业或学分制中修同一门课程的教学组织单位，不是固定的行政组织。有学者指出，今天大陆教育机构中固定封闭式的“班”，既不是传统书院中的一个概念，也不是西方教育的概念，更多的是受前苏联教育体制的影响，而前苏联教育中的“班”，有可能来源于军队的组织编制，是一种有利于配合军事作战的固定组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后，中苏政治交恶，大陆从各个方面摆脱了苏联的影响，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大陆的高等教育更多是学西方，唯独对高校里固定设班这一点没有改变。因为班在学校中属于一级管理组织，而不仅仅是一个教学单位，故我们的一些家长，从孩子入幼儿园开始，就给班主任打招呼，希望能委任孩子做班长或班干部，看重的就是：班长或班干部是一个最基础的职级。

关于导师制的实践。古代私塾中的家庭教师，皇族中为皇子特别是太子所选拔的教师，不仅在学习期间，就是在学习期结束后，师生仍有联系。有些老师甚至就是学生顾问性质的智囊或军师，后代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94页。

②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30页。

③ 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8-129页。

④ 刘源俊《迈向杰出：我的学思历程第二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3年，第97页。

士人热衷于成为所谓的“帝王师”，实际上“帝师”有许多是他们读书时期的保傅。

四、萃取与移植：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传统文化中的教育资源内容繁富，数量极大。虽然也有《礼记·大学》《礼记·学记》《荀子·劝学》、韩愈《师说》这样完整的古典教育学文章，但绝大多数是散章短篇，语录警句。有好多还隐含在碑志、书信、家训、笔记、野史、佛道藏中，多为一鳞半爪，残存小语，需要我们仔细搜集、爬梳整理。在行文风格上，传统的教育文献多采用奇比妙喻，直觉思维的特色非常鲜明，也需要我们不断理论化系统化，并与现代教育理论互释会通。

笔者本人并非泥古或复古论者，没有想用零散的古典教育史料对抗完整的现代教育体制。恰恰相反，笔者意在提醒教育管理者和教育理论研究者注意，传统中国是教育资源大国，有很多资源需要研究，需要萃取^①。

一是用诗教、乐教、礼教等古典素质教育的内容来充实现代素质教育体系。传统教育中有关诗教、乐教、礼教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很多很好的理念，也有非常悠久的实践。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又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他看来，诗、礼、乐三教是三位一体的，是其它教育内容的基础。现代素质教育的提出，出发点与动机很好，但因实践的时间太短，范例与案例太少，没有得到整个华人社会高等教育的广泛认可，还不足以移风易俗，改变风气。故可以直接借镜于古典，使它成为华人高等教育的共识。

前两年教育界都在热议习近平同志教师节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讨论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古典诗词数量的多少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诗词作品数量的多与少的问题，而实质上是诗教的有与无的问题。传为孔子所说的一段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在传统教育谱系中，诗教、乐教、礼教等都是基质的，而在现代教育视野中，这些内容都下降为工具性、技能性与识记性的东西了，与人格、人品、人性毫无关联了。

大家都不会忘记《论语》“侍坐章”中曾皙的“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与孔子的“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在孔子看来，曾皙的演奏所传达出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所以让他心向往之。这种理想境界是一种和美的音乐境界。同样，在孔子看来社会治理的最好状态，也是一种弦歌。至于礼乐从根本上制度上被破坏，基于二十世纪天崩地陷的纲维解纽所导致的礼崩乐坏，我们今天目睹的各种社会怪现状，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二是以文质彬彬的君子教育完善现代的全人教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的一个替换词是“斯文”，传统教育中对培养社会精英君子、斯文有很多论述，也有很好的实践。现代的革命教育，则是对这种传统的不断破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如果在战争年代，谈革命谈暴力谈破坏谈推翻，应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在和平年代，在构建现代文明社会中，应倡导什么，我想并不难理解吧。

三是汲取传统生态文明理念以丰富现代生态教育。前现代的中国是农业社会，教育也是这种文明的衍生物，农业文明曾长期为人们诟病，但农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较和谐，在教育理论中也能看到这些痕迹。《礼记·中庸》第三十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

^① “萃取”一词，借用陈洪先生的概念，陈洪先生曾多次讲对待传统要以萃取、激活、兼容、发展的辩证眼光看待。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现代著名教育学家潘光旦据此总结出“位育”的教育理论^①,这一理论已超越了狭隘的学校教育观念,含有中和位育、遂生乐业的博大思想。《中庸》还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庄子·马蹄》第九描述理想的社会说:“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人与自然界中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万物和谐相处,是鸿蒙初辟时的本初状态,人与自然的不断紧张对立是所谓的人类文明进步的伴生物和代价,到了工业化的现代,这种代价已经高昂到人类无法承受之重,人类才开始慢慢反思。作为一种知识谱系的生态科学,主要产生于西方,但是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就有许多生态文明的智慧,这种智慧至今仍有特殊的启示意义。“古代中国的自然哲学比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更深刻。古希腊人希望通过获取自然科学的知识来探视自然,而中国的古人则将人投入到自然当中,并亲身体验人与自然的神奇的相关性”^②。

四是通过对经典的践行来唤醒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儒家典籍强调仁义礼智信,其中对信的重视,对目前出现的道德溃坝如何防范,通过吸纳并践行传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途径。

五是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来传承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③,以援助现代大学教育所倡导的自由思考、自由探索、自主研究。儒家主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肯定狂狷,鄙夷乡愿,推崇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独立的大丈夫人格,仍有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主义虽然不是主旋律,但我们从“箪食瓢饮”的“孔颜之乐”,到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④,再到程颢的《秋日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英雄。”他的另一首《秋日偶成》说得更透彻:“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蠹螿,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只有精神上“处处自优游”,才能“道通天地”,“思入风云”。

胡适很早就注意寻找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思想成分。1949年3月的一次公开演讲题目就是《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他侧重以谏官和史官制度为例,讨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⑤有人曾问胡适,美国开国元勋、独立英雄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胡适说有,就举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答,认为其言可以立懦,多次手书成条幅赠友人(见附图三)。他说古代用此专指谏诤的自由,现在则指言论的自由^⑥。汉学家狄百瑞也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自由传统,并作了更为深入的发掘和阐释,他强调宋明理学中的自由思想,还特别以黄宗羲为例,阐释黄所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公其非是于学校”等思想,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政治上分散权力,法律上维护尊严,学术上独立自由。与胡适从谏

① 参见潘乃谷、潘乃和编《潘光旦教育文存》,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② 史怀哲《中国思想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③ 本文所用“古典自由主义”一语,与政治学上该词的指涉无关,而是与前面的古典大学教育呼应,仅仅是指前现代而已。

④ 范仲淹《答梅圣俞灵乌赋》,见《范文正公文集》卷一。

⑤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第2078-2081页。

⑥ 原载1955年4月台北《自由中国》第十二卷第七期。

官、史官入手不同,狄百瑞更多强调经筵讨论、书院制度和朱熹的教育思想中的自由意涵^①。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二人学派不同,见解各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双方“同值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体现出在学术上的和而不同,在《明儒学案》的《发凡》中,黄宗羲还说:“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②

庄子的逍遥高蹈仍是士人追求精神自由的偶像:“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提出“两种自由概念”,第一种自由概念,带有“消极”的含义(negative),旨在回答在怎样的领域,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应该免于他人的干涉?第二种自由概念,带有“积极”的含义(positive),旨在回答何物、何人,能够决定人的存在与行为?换言之,在柏林看来,前者是“摆脱……”的自由,后者是“成为……”的自由。有人认为,前者与道家式的自由接近,后者与儒家式的自由接近^③。倡导“名著计划”、主编过《西方世界的经典》的美国学者莫提默·J·艾德勒进一步提出,思考自由时要注意区别三种自由,即是社会自由(或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精神自由(意志自由)、道德自由^④。

五、本文的初步结论

从传统文化视野中探索找寻高等教育资源,可以发现其数量巨大,内容繁富,这些本土资源对于破解当下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难题,建构既有现代视野又有本土根柢的当代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通过初步梳理传统文化中的高等教育理念,对文献中所述古代高等教育实践的一些案例进行新的阐释,可以对本土教育资源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有更清晰的认知。

当代教育管理者可以通过对传统教育资源的萃取或创造性转化,来援助并丰富现代高等教育的思想体系。例如以诗教、乐教、礼教等充实现代素质教育;以君子教育来完善全人教育;汲取传统的天人理论内涵丰富现代生态文明教育;通过践行经典来唤醒诚信意识;以和而不同的理念弘传古典自由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谈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⑤,其实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宗旨,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⑥处颇多,学人应该多做打通和会通的工作,这既是为了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用”,更重要的也是处身于大数据时代的我们应该具有的大智慧和大境界。

(本文原刊于《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3期,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① 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李怀祺等翻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中文版,第120页。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③ 刘国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现代启示》。

④ 莫提默·J·艾德勒《大观念:如何思考西方思想中的基本主题》,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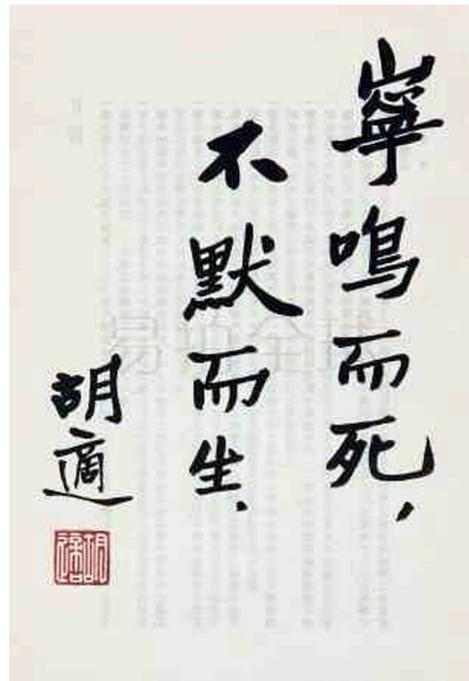
⑥ 钱钟书《谈艺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附图一：台灣中興大學“孔學要旨石碑”



附图二：“天地君亲师”牌位



附图三：胡適手書范仲淹名言